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五十期 2003年6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50, June 2003.

90年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媒體建構*

黃煌、李金銓

Media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1990s

by
Yu Huang, Chin-Chuan, Lee

關鍵字：主流傳媒、民族主義話語、媒體建構、中美關係、市場化、黨國體制
Keywords: mainstream media, nationalism discourse, media construction, China-U.S. relations, marketization, party-state system

* 本文根據英文原稿增補改寫，作者向兩位匿名評審員提出寶貴意見致謝。

收稿日期：2002年7月1日；通過日期：2002年11月24日。

Received: July 1, 2002; in revised form: November 24, 2002.

黃煌通訊地址：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

email : so3033@hkbu.edu.hk

李金銓通訊地址：香港城市大學英文與傳播系

email : enclee@cityu.edu.hk



摘要

自 1990 年代以來，大陸的主流傳媒一直處於一種內外夾攻的焦慮和緊張狀態中：它需要尋找政治上安全，經濟上兼具效益，同時又能主導公共議題的媒介產品，以便在日益商業化的經營環境中生存謀利，發揮媒體的影響力。隨著後天安門時代大陸內外局勢演變，主流媒體終於發現，以民族主義作包裝，炮製民族主義的媒介產品是走向市場成功的法寶。也就是說，主流媒體一方面設法在官方允許的界線內煽動大眾之情緒，製造吸引大眾的議題；另一方面，媒介通過生產和售賣民族主義的產品獲得可觀利潤。在傳媒、共產黨、市場和受眾的互動關係之中，中國大陸主流媒體發現自己正置身於一種類似“帕雷托佳境”(Pareto Optimality) 中。本文嘗試對這個主題作出整理梳爬，比較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主流媒體不同的話語建構，歸納媒體上再現的民族主義三套話語和代表論述，並從 90 年代的市場炒作、政治張力的複雜關係中揭示媒體與社會變化的互動起伏，以理解傳媒在後天安門時代日愈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

Abstract

The media in mainland China today have found themselves in a winning position. Whilst still required to deliver Party ideology, they provide a seemingly more plural and informative image through the use of a populist style that caters to the expanding commercial environment. Much of this can be seen in the media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ist discourse" in the 1990s. This nationalist frame is both commercially popular and officially endors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various patterns and strategies of the media's nationalist framing.



將美國形象霸權化，並將其描繪成一個企圖支配世界，企圖遏制與主宰中國的國家是絕不真實的。…然而，這類報導卻不斷地在中國傳媒中出現，這只會在我的國家引起負面的反應。

——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科恩，2000年7月 北京
 科恩7月份在北京不負責任地發表誤導性的言論後，包括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和有線新聞網絡在內的美國媒介，緊跟著發表妖魔化中國媒介的文章。鑑於美國自身陷於其中的尷尬局面，美國媒介實在應該先照照自己的鏡子，而不是忙著朝別人身上潑污水。

——《中國日報》2000年7月31日

2000年7月13日，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科恩抵達北京。這時距離美國戰機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已經過了14個月。他的走訪是要恢復中美兩國高層的接觸，尤其是軍事領域的雙邊交流，不料當天官方的英文《中國日報》頭版却以這樣的頭條標題歡迎他：“美國是世界和平的威脅”。該報記者列舉了美國近年來在全球擴張的累累“罪行”：以“人道”為藉口軍事干預其他國家，試圖興建導彈防禦系統，阻擾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等，此外還嚴厲譴責美國不顧世界的意願追求軍事霸權。諷刺的是，儘管中美政府私下表達了和解的誠意，官報的頭條報導還是彰顯了中國主流媒體對美國愛恨交織高揚的民族主義情緒。這類報導製造出一種“劍拔弩張”的氣氛，數天後科恩在北京的國防大學發表演說時，特地指責這類報導絕不真實。《中國日報》等他一走，就在7月31日撰文反擊，歷數美國媒體如何妖魔化中國。

科恩事件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它顯示了當今中國大陸的傳媒如何把握時機來炒作民族主義的議題。事實上，自李希光和劉康在1996年提出美國主流傳媒‘妖魔化’中國的命題以來，所謂的中國國際形象不佳，是由於西方媒體‘妖魔化’造成之說，已成為官方和民間共享的強勢煽情話語。因此，它也成為媒體製造的當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一個象徵符號和暢銷商品。1990年代，中國的主流傳媒不但政治上

要求安全，經濟上還要賺錢，尤其是天安門事件以後，市場化一浪高過一浪，主流媒體發現民族主義竟是賺錢的法寶，於是它們在官方允許的界線內製造議題，煽動大眾情緒，然後通過生產和兜售民族主義的產品大獲其利。引導公眾消費這一類民族主義的產品，以經濟發展為名鼓吹享樂主義，變成了媒體重要的企業行為。在與共產黨、市場和受眾的互動關係之中，主流媒體置身於類似“帕雷托佳境”(Pareto Optimality)：照理說，媒體煽動大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往往會玩火自焚，但在 1990 年代的社會情境下，媒體打民族主義牌却如在安全地帶玩火。

質言之，自從 1978 以來，中國市場自由化使傳媒體制和經營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來完全由黨國喉舌所支配，現在它們逐漸與市場導向的傳媒共存，單一體制不斷走向雙軌制，即：新興的市民——市場導向的商業媒介同傳統的黨控媒介並存，它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補缺”。原來傳媒在政治上是黨的喉舌，在經濟上由政府財政統包；現在它們還是聽命於黨國，但在財政上却日益自主，經營上貼近市場。它們在黨國的保護下放心賺大錢，傳媒可以說是黨國獲取暴利的最後堡壘，媒介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會去觸摸黨國的虎鬚 (Lee, 2000a)。所謂的主流傳媒包括由黨宣傳部直接控制的機關報以及市場導向的商業媒體（如發行量大的都市報，晚報等），他們合伙壟斷公共話語資源。黨喉舌只能傳遞官方指令，但商業化媒體則多少必須反映大眾的需求和情緒。在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以後，傳媒不斷尋找一些政治上安全，經濟上有利，又能吸引大眾的話題，生產輿論，製造文化消費，其中煽動民族主義和鼓吹消費主義是兩條貫穿的主線，媒介利用其特殊地位營造一種“多贏”的局面，一種類似“帕雷托佳境”(Pareto Optimality)的狀況。至今甚少有文獻探討中國 1990 年代大陸民族主義興起與大眾傳媒的關係。本文希望對這個主題作出整理梳爬，首先比較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主流媒體不同的話語建構，並從 90 年代的市場炒作揭示媒體與社會思潮的互動起伏，以理解

傳媒在後天安門時代、日愈高漲民族主義思潮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國歷史情境中的民族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是一個近代的歷史現象，中國在漫長的文明史上是封建王朝統治，是一個“文明體系，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Duara, 1996; Pye, 1996)。民族主義發端於近代歐洲的民族國家運動，當中國被迫進入一個由西方主宰的現代世界體系時，本土的民族主義運動也應運而生(Levenson, 1967; Townsed, 1996)。從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隨著節節戰敗與許多不平等條約的屈辱，中國產生了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思潮，其主要的訴求就是救亡圖存、強兵富國，和對抗西方(Zhao, 2000:2-5)。如果民族主義在西方民主政治發展中是保護個體自由的一種集體訴求，在近代中國的語境裡却成為“集體主義”或“國家主義”的代義詞，為的是集體的啓蒙和救亡，而不是爭取個人自由和權利(李澤厚, 1987)。因此 Schwartz (1993:247) 認為，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的產生“代表著現代中國文化的重大轉變”。民族主義更是共產黨在抗爭國民黨過程中的動員力量(Chalmers, 1962)。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西方既是含有敵意的外來者，也是現代化的老師；“外來影響”一詞包含著接受與排斥的雙重含義，現代化經常是西方化的同義詞。對西方愛恨交織的矛盾，決定了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及現代化進程中複雜和游移的特性。

近年來學界對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看法不一(如，Shambaugh, 1996; Unger, 1996; Rosen, 1997; Zheng, 1999)。Whiting (1995) 將中國當代的民族主義分為三類，即“肯定型”(affirmative), “武斷型”(assertive) 和“好鬥型”(aggressive)。“肯定型”突出本民族的長處和成就；“武斷型”除了肯定民族的自豪感，還加上具有競爭與敵意的“他者”；“好鬥型”則更進一步視“他者”為嚴重威脅，必須加以還擊。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從“肯定型”發展到“武斷型”(見 Segal, 1996)；有的認為19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興

起是為了因應外來的挑戰，而不是甚麼預謀 (Zhao, 2000; Yan, 2001)；也有人認為當局借煽動操作民族主義來重獲政治上的合法性。更有人認為近年的民族主義浪潮比以前更具侵略性，更富沙文主義 (Friedman, 1997; Liu, 2000)。

以下，我們將分別敘述和分析 1980 年代大陸主流媒體上出現的親西方的自由主義啟蒙運動及隨之掘起的 1990 年代以反西方（尤其是美國）為特徵的民族主義浪潮。

1980 年代新啟蒙運動

1990 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反西方，與 1980 年代的親西方形成了鮮明當對照。80 年代是伴隨著“三個信念危機”開始的。共青團中央的《中國青年》雜誌登了潘曉的一封來信，却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集體思想危機。潘曉抱怨周遭人們自私冷漠，缺乏利他精神，作者質疑黨的教義的合理性。編輯部在 25 天內收到 18,603 封讀者來信，許多批評直指黨的宣傳灌輸，並表達對現實的不滿與失望。“三個信念危機”指的是信心危機、信仰危機和信任危機，是對毛澤東實踐共產主義失敗的一種曲折表述，反映了公眾對其激進統治的幻滅，用韋伯的話來說，它標誌著一個“脫魅”過程的開始，同時也意味著以引進以自由主義為特徵的“新啟蒙運動”發軔（詳見 Wang, 1998；蕭功秦，2002）。

整個 80 年代直到 89 年天安門事件為止，知識分子和黨內高層的改革派官僚結成聯盟，運用傳媒討論一系列公眾議題，諸如思想解放、經濟開放、政治改革、新聞自由等，並時常將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經驗作為參照點 (Lee, 2000a)。這個以改革派主導的“官方話語”和自由派為主的“精英話語”共同構造的媒體現象，在民間獲得巨大反響，其中心命題是引入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科學技術、文化價值，同時也激烈批判傳統文化為現代化的障礙 (Barme, 1999)。

新啟蒙運動的思想解放使個人意識開始甦醒，1980 年代中期一項頗有影響的全國調查顯示，媒介在塑造公眾意見的過程中發揮了極大

的影響力，大眾與精英對現代民主價值和自由理念在認知層面上有較強的趨同（閔崎，1989）。當時，新聞界和黨內改革派結成了鬆散的聯盟，媒體成為威力巨大的公共啓蒙論壇，加速自由思想的傳播（Lee, 1990）。例如《人民日報》的胡績偉、劉賓雁、王若水，在黨內改革派支持下，積極鼓吹改革開放，迂迴鞭撻毛澤東的烏托邦理念（胡績偉，1989；王若水，1997）。另外，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週報）在9年間（1980-1989）成了新聞改革的先鋒，有系統地引介西方當代主流理論，為改革開放提供思想及理論資源，還大膽發起了多次推動政治改革的辯論。¹

傳媒在新啓蒙運動中的角色，不僅僅局限於新聞領域。不少知識分子刊物和系列叢書也紛紛面世，系統地介紹了西方各種思潮，鼓吹新觀念，範圍涵蓋哲學、經濟、政治、科學與文學等。這些刊物包括《讀書》（1979創刊，1990年代中期以來成為新左派的旗艦）、《走向未來》（1984）、《青年論壇》（1985）、《文化：中國與世界》（1987）、《新啓蒙》（1988）、《思想家》（1988）等。同時，大量翻譯出版西方人文社科的經典著作，它們的思想、理論、觀念在各個領域廣泛傳播，知識分子驅動的思想解放運動借助傳媒日愈深入人心。

中央電視台1988年播放六集電視紀錄片《河殤》，一周內已收到3000多封來函，報章和電台的討論更是鋪天蓋地，社會反響熱度及公眾討論的廣度大出人們的意外。這是80年代新啓蒙運動中的高潮。這部片集藉古諷今，批判兩千年中國的專制統治，強調全方位對外開放，引進西方的海洋文明來改造古老的黃河文明。1989年官方把它和《世界經濟導報》並列為“六四反革命暴亂”的精神資源（蘇小康

1. 如1988年初，就中國是否應該加快改革開放融入全球化進程的問題，《世界經濟導報》展開了一場著名的“球籍”大辯論，其主要論點是呼籲中國加快全方位開放，如不加速進行有效的包括政治層面在內的體制改革，將會喪失地球大家庭成員（“球籍”）的資格（Yu, 1992）。它的自由色彩鮮明，89年北京民主運動期間被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下令封閉。

等，1988）。

簡言之，80 年代的自由主義思潮和親西方的話語傳播，是對毛澤東烏托邦激進教義的幻滅和反動。它的產生和發展和四個因素相關：(1) 80 年代初開始了相對成功的市場經濟改革；(2) 舊的共產主義理念與話語在文革後喪失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民主自由理念逐步成為新的思想資源；(3) 傳媒與改革派官僚集團及知識分子結成聯盟，積極充當社會變革的代言人；(4)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對實現現代化目標和手段有相當程度的共識。但 1989 年天安門六四鎮壓挫折了自由主義發展的勢頭。

天安門事件後官方民族主義話語的建構與確立

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新啓蒙運動劇變的轉折點，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親西方力量與保守力量的一場大攤牌。政治精英們在 80 年代對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浪漫期望，以及啓蒙運動倡導的自由民主理念，隨著六四鎮壓顯得不合時宜，不少人的抱負由推動政治改革轉向追求物質財富。當局意識到鎮壓行動徹底毀掉了共產黨統治最後的、傳統的合法性基礎。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新的領導集團除了大力推動經濟自由化以外，更意識到必須抓住民族主義的話語，改以“愛國主義”在媒體宣傳包裝，才能重建合法性。Huang (1995:57) 指出：“當局在後天安門時期熱情地擁抱民族主義，將其視為合法性的源泉。這個戰略看來已經奏效，這可以從日益高漲的大眾反美情緒中得到證明”。

如前述，六四鎮壓後，共產黨急需物色巧言的文人新貴，來建構民族主義的話語想像。90 年，它發動龐大的宣傳機器，捧出了一位“學者明星”——何新，由他建構愛國主義和反西方的言說。何新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員，在天安門事件後迅速成為官方寵兒，發起一場他稱之為“捍衛中國國家利益”的戰役。他及時嚴厲譴責 80 年代的新啓蒙主義運動，認為傳播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的思想會顛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他為當局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辯護，認為如此才能維護社會穩

定和秩序。官方把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何新却把它升級為維護中華民族長遠利益、捍衛中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合法權利之鬥爭（何新，1991，1996）。何新這一套“新穎”的敘述和解釋，為陷入內外交困的當局提供了救命稻草。為此，《人民日報》1990年12月11日破天荒發表了何新單方面編撰且未經對方認可的所謂“何新與日本經濟學者教授S的談話錄”。全文近20,000字，題為“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在談話錄前，《人民日報》以編輯部的名義，加了一篇八百字的“編者按”，盛讚何新堅定的“愛國主義立場”。官方稱何新的文章“在國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在讀者中產生了大面積的、多層次的、長時間的‘轟動效應’”，稱頌該文引起的讀者來信之熱烈躊躇，是《人民日報》編者“辦報20多年沒有見到過的現象”（孫永仁，1991）。至此，民族主義受到官方青睞，是天安門事件後維護一黨專制和社會穩定的思想資源。當然，出於策略的考慮，當局在其官方媒體的話語建構中稱之為“愛國主義”。有些新一代民族主義文人甚至將何新定位成當代新愛國主義的理論教父，因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最有影響的愛國主義思想無不延著（何新的）這一思路生發”（房寧、王炳權、馬利軍等，2002:87）。

1991年9月，一群中共高層子女為主（被稱為“太子黨”）的新保守派炮製了另一個準官方版本的民族主義話語。他們在流傳深廣的一個綱領文件中提出：中共要在後冷戰不利的世界格局中生存和發展，對抗西方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之策略，必須改用民族主義作為政治統合的法理基礎，因為，“新時代的國際形勢演變，已經將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從國內轉化為國際間民族國家的利益衝突”（《中國青年報》理論部，1991年9月9日）。

為了挽回民眾中的負面形象，當局運用傳媒，發起聲勢浩大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向青少年進行“國情教育”。上任不久的黨總書記江澤民親自抓，他要求傳媒讓年輕人明白，只有共產黨才能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才可令中國強盛繁榮。江還指定一系列愛國主義宣傳材

料列入中學和大學的政治課程 (Barme, 1999:256-258)。黨中央最高理論刊物《求是》的社論說：“愛國主義”具有特殊的歷史性，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內涵。今天，如果我們要成為一位愛國者，我們應當熱愛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鄧小平同志在1981年的一次講話中指出：有人說不愛社會主義並不等同不愛祖國，難道祖國是一個抽象概念？假如你不愛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你還能愛甚麼呢？（《求是》1990:8）。

通過這一系列媒體操控，官方艱難地轉化政治話語：由毛澤東時代的“烏托邦”的激進理想，到80年代啓蒙解放，再經“六四”後形成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法統、經濟改革績效為主軸的實用主義話語體系。中共當局通過媒體的輿論導向和話語建構，將自己塑造成中華民族福祉的化身，中共統治的合法性由“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變成了帶領中國人民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的愛國主義工程（Project）。因此，Pye指出（1996:106），公民批評或挑戰當局的制度方針，就會被指責為不愛國，並受到懲罰。

九十年代反西方的中國民族主義興起

經過傳媒的系統宣傳，愛國主義的官方話語開始注入了大眾意識之中。1993年，北京競逐2000年奧運會主辦權敗北，引起官方的愛國主義話語和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匯流。官方媒體以“給中國一個機會”為口號，把這件事解釋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聯手反對中國（宋強等，1996:342-244;156；Yan, 2001:36）。一位北京律師說，“從這刻起，中國人開始相信是美國在遏制中國”（Chanda and Huus, 1995:20）。

天安門鎮壓以後，及隨後中國發動“反西方和平演變”宣傳，致使國際社會及其主流傳媒（尤其是美國）的主流價值和北京當局尖銳對立。中國當局又不斷聲稱只有它能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西方主流媒體本來就較關注中國政治與社會的陰暗面，如人權、異見分子、西

藏問題和宗教自由等，並常有黑白分明、簡單劃分“我們對他們”的傾向（李金銓，2002），對中國民眾的民族情緒也推波助瀾。一些新聞被視為與中國對抗及對中國人民的侮辱，例如 NBC 的體育節目主持人 Bob Costas 在 1996 年亞特蘭大奧運會開幕式時，暗示中國運動員成績好是靠定期服興奮藥獲取的；例如台灣總統李登輝 1995 年訪問美國，台灣 1996 年首次全民總統選舉；例如美國國會每年辯論要不要給中國最惠國待遇，定期成為嚴批中國人權紀錄的論壇。

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學者和記者在 90 年代中期出版了一批被視為有意圍堵中國的專著，例如《中國覺醒》(China Wakes) (Kristof & WuDunn, 1994)、《圍堵中國》(Containing China) (Rachman, 1996) 和《即將到來的同中國的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Bernstein and Munro, 1997)。這些書被中國媒體引為西方敵視中國及阻止中國強大的明証。本來民族主義已經顯得騷動不安，現在又夾雜反美情緒。1995 年 7 月 14 日共青團機關報《中國青年報》公布“中國青年眼中的世界”的調查結果，87.1% 的回應者表示“美國是最敵視中國的國家”。其中，81.6% 以電視為了解美國的主要渠道，76.1% 靠報紙，25.5% 靠“朋友介紹”獲知（《中國青年報》1995/7/14）。仇美意識固然和官方傳媒宣傳美國是八九民運幕後黑手有關，更與 90 年代初期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中國當局的敵對有關。國際關係學者 Yan (2001:36) 指出：中國人民開始相信美國不願見到中國強大，不斷打壓中國，以便繼續支配世界。

於此同時，一批有影響的刊物開始討論民族主義與當今中國的問題，一些具煽動蠱惑的文章獲得熱烈回響，使民間的民族主義情感不斷升溫，並獲得一批知識精英的支持。許多討論言詞激烈，批評嚴厲，不僅著眼於民族主義，還涉及當代西方激進時髦的學術思想及後學話語。其中，《戰略與管理》、《讀書》、《天涯》、《國學》、《開放時代》、《東方》、《中國文化與學術》、《視界》等刊物是知識精英闡述其主張和理念的主要平台。這些出版物的不斷湧現，社會，迎合新左派冒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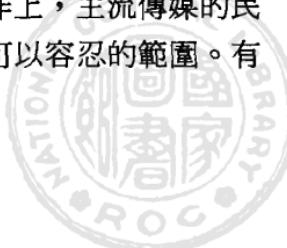
的需要。這個由少數知識精英構成的中國“新左翼”運動催生普及了民族主義思潮，也反過來增加這個運動的大眾基礎和正當性。《讀書》雜誌主編汪暉為這一運動提供了合法性和生存策略，他指出“中國的現代民族主義從一開始便具有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的特點”（汪暉，2000:11）。

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之火越燒越旺。1996年，由一群年輕的大學生撰述的《中國可以說不》及由學者和記者寫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成為轟動一時的媒體暢銷書，成為反美宣言的代表作。有關這兩本書的主題和論點，我們將在後面討論。此外，香港回歸是傳媒精心設計的另一齣宣揚民族自豪的大戲，它們通過舉國狂歡的場景，宣揚民族主義的預設主題，反覆歌誦中共領導下的“光榮成就”（Lee et. al., 2002）。

總之，中國傳媒在整個90年代建構的民族主義愈來愈煽動，愈激情，主導話題是反西方，反美國。這股思潮始於90年代早期，至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2001年中美軍機在南中國海相撞時達到沸點。其間，民粹式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狂熱認同愛國主義，主流媒體獲得議題設置的主動權，也贏得了巨大的商機。主流傳媒已不僅僅是黨的喉舌，還為了自身的利益，他們還充分發揮了塑造輿論設定議題的特長。於是，政治需要與市場邏輯結合，消費文化的流行，外部壓力及黨的軟硬操控，造就了媒體生產民族主義的有利條件。

當前中國民族主義的代表論述和主張

從話語建構的角度來說，90年代中國大陸流行的民族主義主要有三套話語：愛國主義的官方話語，民粹式民族主義的民間話語，以及聲稱抵抗西方霸權的新左派知識精英話語。在操作上，主流傳媒的民族主義立場和話語容或不同，却都沒有逾越當局可以容忍的範圍。有關論述的主題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



(1) 逆向種族主義

所謂的逆向種族主義，是對80年代中國知識界崇洋媚外和自我貶低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心態的一種反動，90年代大力提倡的中國民族主義就是要將之反過來。這個名詞於1996年由王小東在香港《明報月刊》提出（當時使用筆名石鐘）。他是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曾留學日本。他解釋，“逆向種族主義”在英語中原指在美國通過“糾正行動”來補償一些白人利益的政策或行動。他將這個名詞移植到中國的情境中，認為80年代中國主流知識界的“逆向種族主義”是一個罕見的不正常現象，是由自卑感產生的、動不動就將中國人視為低級族類的心態構造出來的（石鐘，1997；王小東，1999:82-87）。電視片集《河殤》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認為90年代興起的民族主義，不過是80年代“逆向種族主義”的正態回歸。王的論述頗受一些青年歡迎，視之為當代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主要發言人。不過，王小東還強調中國必須實現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這是其他鼓吹大眾民族主義者所罕見的。

(2) “中國可以說不”系列

“逆向種族主義”僅是刺激大眾民族主義情緒的前奏曲，“中國可以說不”系列與“美國傳媒妖魔化中國”系列則代表了主旋律。1996年，宋強、張藏藏、喬邊等數位年輕人出版了一本書，題為《中國可以說不：後冷戰時代的政治與感性的選擇》，結集報刊文章，分頭編撰極端的民族主義煽情的話語。該書出版時，作者沒人訪問過西方國家，更遑論有在美國的生活經驗。

《中國可以說不》及其續篇《中國仍然可以說不》（宋強等，1996）、《中國為甚麼說不》（彭光謙等，1996）、《中國何以說不》（張學禮，1996）等系列，掀起了一場大眾民族主義的煽情高潮。這些充滿了反美的情緒和沙文主義的敘述，引發了廣泛的媒體討論，煽發年輕人建構民族主義的想像空間。這些暢銷書籍讓出版商、作者和乘勢炒作的主流媒體都獲得可觀的商業利潤。據報導，《中國可以說不》在一個月

內就賣出了 25 萬冊“合法”的版本 (Li, 1997:159)，還不包括數量不詳的盜版本。官方新華社還破例在書剛面世時就發布全國通稿，上海的《文匯報》隨後在一篇報導盛讚此書表現了“年輕一代的勇氣及愛國主義精神”(《文匯報》26/6/1996:4)。

說“不”系列使用“我們對抗他們”的二分法論述，主題簡單又煽情。它說美國為首的西方強權企圖挑起一場新冷戰，來遏制正在強大的中國；又說，美國把中國當作首要敵手，全力打壓，中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反擊，對美國大聲說“不”，並隨時準備和美國打一場全面戰爭 (1996:38-42)。《中國可以說不》將美國描繪為道德墮落、邪惡張狂、仗勢欺人，恐嚇征服他國的惡棍。它抓住美國國內的種族主義、暴力、罪行、性騷擾等問題，詰問：“這樣的國家怎麼可以教訓別人？”美國“討厭而又徒勞”，“可鄙而又可憐”，“不知未來走向”的霸權帝國 (1996:230)。作者聲稱，21 世紀將是中國世紀，中國將是世界和平與進步的源泉，中華文化及其價值將對未來的人類文明發揮巨大影響。全書用一種極度宣洩的敘述方式，例如“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不要忌言準備打戰”等，煽動民族情緒，一時間在青年中影響極大。

(3) “美國傳媒妖魔化中國”系列

與“中國可以說不”系列比較，1996 年年底出版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及其續集 (李希光、劉康等, 1996；李希光, 1998；李希光&劉康, 1999) 顯示了精製話語的建構力量可以更有效地挑動或刺激公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想像。和“中國可以說不”俱樂部不同，“妖魔化”系列書的作者多有一些顯赫的學歷和經歷，他們或在一流的主流媒體從事新聞工作或在美國大學從事教學研究，這種特殊的優勢以及他們掌握嫋熟的敘述技巧，令這些知識精英更容易將公眾的注意力從泛泛的反西方造勢集中到“丑化中國形象的生產者—以《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為首的美國主流媒介”上來。作者藉此創造了一個感性的貶義新名詞“妖魔化中國”(demonizing China)來形容美國精英

傳媒對中國的敵視態度及丑化手段（朱立，1997）。

他們認為，美國新聞界妖魔化中國，是為美國反華全球戰略而服務，而中國近年在國際上聲譽不佳，主要是美國傳媒蓄意妖魔化的結果。作者將共產黨當局和國家民族等同，其實西方傳媒批判天安門事件以後的專制統治，未必就是反華反人民。作者無視於共產黨控制傳媒，壓縮言論，反而矛頭避開政權反民主的本質。1997-1999年間，作者們圍繞“妖魔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書籍，包括《中國有多壞？》（李希光，1998），《妖魔化與傳媒轟炸》（李希光、劉康，1999），《贊賞與遺憾：我看美國傳媒》（熊蕾，2000）等。

誠如這個系列書籍的名字所指，其中心話題主要圍繞美國傳媒妖魔化中國的議題建構。他們認為，美國妖魔化中國，是出於美國記者的意識形態，是出於盎格魯撒克森白人資產階級狹隘的優越感。他們甚至開列一張表格，說明美國妖魔化中國可以得到甚麼好處，例如可以破壞中美關係，嚇走中國的投資者，轉移世界對美國霸權與擴張的注意力，加強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及反華聯盟，使中國“南斯拉夫化”，最終搞垮中國等等。他們還列出美國傳媒妖魔化中國的手段，即以“人權”為中心攻擊中國，塑造中國為敵人，使用虛假消息、捏造事實、玩弄損人利己的語言遊戲，操控新聞資源進行媒體轟炸等等。總之，“說不”系列用民粹話語鼓動中國的青年起來對抗美國，而“妖魔化中國”系列則進一步以新聞專業術語，加以若干學術辭彙的包裝，將大眾的憤怒情緒引導到美國主流傳媒對中國形象“妖魔化”的外因上來。

(4) (新左派) 建構抵抗西方話語霸權論

廣義而言，中國大陸90年代民族主義復活，與新左派知識精英崛起同步相關。新左派精英分子為大眾民族主義奠定理論基礎，而民族主義思潮則通過新左派反對資本全球化的運動而具體化。

90年代中以來，新左派在大陸思想界嶄露頭角，日趨活躍。新左

派是相對於大陸語境中的“老左派”而言。“老左派”通常指 80 年代一群以捍衛中共正統意識形態為己任的共產黨理論官僚，首腦人物為胡喬木和鄧力群，他們把黨內改革派知識份子紛紛掃地出門，不料自己却在 90 年代的權力列車中靠邊站（見 Lee, 2000b）。新左派主要是一群學者、作家、知識分子等思想文化精英，他們沿襲反西方霸權的“抵抗話語”，在中國推進反國際資本全球化的運動。他們大多受過人文社科訓練，不少在美國著名學府取得博士學位並任教。他們聲稱站在社會公義立場，批判中國大陸自由派鼓吹實行市場經濟和議會民主的理念，其代表人物甘陽自稱為“自由左派”（Gan／甘陽，1998; 2000）。

他們最關注傳媒的再現（representation）與文化身份認同的問題。他們宣稱，中國知識精英缺乏一套理念和構架去抗衡西方支配性的話語。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張寬指出：有時候我們完全失去了抗衡西方霸權主義與殖民主義話語的勇氣，每當與西方國家談判人權、開放市場、知識產權時，就顯得非常被動，因為我們缺乏擺脫西方框架的話語方式（1995:36-37）。然而，中國新左派所建立的批評話語和論述，其所用的理論資源正是由西方引入的。他們從西方左翼批評理論和話語中汲納的理論資源，主要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後殖民主義，以至於女權主義等。但一如薩以德所批評的，他們將特定時空意義的前衛理論極不恰當地轉變，供其“在新時代、新地點採用的新方法、新立場”服務（Said, 1983:227）。

新左派認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主要問題已不是改造專制列寧主義國家機器，而是反抗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資本擴張和市場霸權。因此，他們把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視為歐美社會的既存問題來評說批判，認為中國利益和西方是根本衝突的。據此，新左派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是抗衡全球資本化的國際抵抗運動的組成部份（汪暉，2000:10-14），支持方興未艾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也就成了新左派的根本戰略於文化認同的議題。他們並企圖重建“烏托邦”的中國社會，實行“平等的

自由，全面的民主”（香港《信報》2000:15）。一些激進的成員甚至提出，只要經過適當的修正，毛澤東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方案是制度創新、解決中國難題的良方（崔之元，1994；1996）。蕭功秦（2002）認為這些新左派從批判資本主義全球化角度出發，提出社會正義與平等的價值訴求，具有自封的“底層”平民意識、反精英主義的民粹主義傾向，與強烈的道德優越感和反西方情緒。

但中國新左派終究不能迴避中共一黨統治的本質，不能一味把黨國看作抗衡披著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外衣的美國霸權之聖徒，也不能無限上綱地詛咒美國和西方傳媒對中國的批評。在這個意義上，新左派的立場看似激進，實則保守，因為它受制於黨國所規限的文化市場和政治話語中，它的複雜和矛盾充份反映了後天安門事件以後大陸所謂的激進批判力量的困境和無奈。

(5)超限戰：

同以上數種民族主義的話語建構相比，鼓吹軍事較量，以戰爭最後勝利為賣點的民族主義論述就顯得更為精彩、冷酷及富有想像力。1999年市場上出現了《超限戰：對全球化時代戰爭與戰法的想定》一書，兩位作者均為空軍大校。正如題目所示，它討論的是一種超級戰爭，一種不受任何現存戰爭法規或常規限制的打法，也無需考慮任何國際公約的限制。作者認為，由於中國目前軍力不夠強大，如要在未來的戰爭中打敗美國，有必要研究“超限戰”。因為“這是一種可以超越實力局限和制約的戰爭方式，因此，它對處於強勢和弱勢的國家都具有同樣的價值和意義”（喬良&王湘穗，1999:255）。書中有一張流程圖，總結了24種驚人的超限戰戰術，例如恐怖戰、網絡戰、金融戰、毒品戰、生態戰等。作者認為任何在常規意義上不道德的方式和武器，只要有助中國擊敗美國就是正義的；美國有最先進的軍事力量，中國不可能打常規戰，只能在未來打“超限戰”制勝。

簡言之，此書的新穎之處在於指出未來戰爭是無疆界、無節制、

不分平民或軍人的全方位進行的。此書出版後迅速暢銷，在短短的一年間，再版 7 次，銷量高達 70,000 冊，創下了近年同類書籍銷量紀錄。作者之一喬良表示，有 120 位將軍向他索取此書，一位空軍副司令員要求軍中高級將領研讀此書。美國軍方於 1999 年夏組織了二十多人用兩個月時間將之翻成英文，美國著名的西點軍校將它列於參考書目中，而美國國防部則已將此書配發給高級將領研讀（《亞洲周刊》，2000/10/12；香港《文匯報》，2001/10/15, C1）。

傳媒炒作的民族主義產品特點分析

政治的需要加上商業誘因，使媒體大批量生產民族主義的產品。1996 年至 2000 年間，中國報刊雜誌發表了一大批此類文章，出版商則紛紛推出鼓吹民族主義的暢銷書。如：《中美軍事衝突前前後後》（洪永宏等，1996）、《中美較量大寫真》（陳峰等，1996）、《與美國對抗》（吳一夫等，1997）、《傾聽中國：新冷戰與未來謀略》（何德功等，1997）、《中國九次說不》（李健，1999）、《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與改革陷阱》（楊斌，2000）、《人類的希望在中國》（瞿湘，2000）、《穿越臺灣海峽的中美較量》（宋連生&鞏小華，2001）、《何處是“美利堅帝國”的邊界》（張海濤，2002）等。概括而言，這些書籍文章大致有以下一些特點：

第一，這些文章都採納一個“我們對他們”的武斷型框架，抓住對方痛腳進行嚴厲譴責。在這些個案中，最常出現的就是美國的超級霸主地位與 1989 年天安門事件以來兩國間摩擦起伏的關係。它們聲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企圖以武力遏阻上升中的中國（例如，1995 年李登輝訪問美國觸發台灣海峽危機，美國派出兩艘航空母艦進入台海干涉）；對中國進行政治顛覆（例如，支持不同政見者、支持西藏獨立運動、支持法輪功，以及每年一度譴責中國人權狀況）、文化滲透及傳媒妖魔化中國。

這些共性導致了第二個特點：這些論述缺乏學術的嚴謹性（除了

新左派的一些學術作品除外)。他們敘述語言大多情緒化，混雜著憎恨、懼外或侵略性心態，有時甚至使用病態或歇斯底里的語言。如在“說不”一書中，到處可見“賤呸”、“報復”、“打仗”、“完蛋”、“不許放屁”等詞語。許多敘述充滿煽情作風，混雜著自滿自怨或虛無主義情緒，競相使用極端的文字去激發公眾的怨恨。這種文風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大批判”話語極為相似。在這種情況下，誇大、歪曲、誤導、錯謬，層出不窮，有些則故意運用精巧熟練的敘述技巧，誤導公眾。這裡僅舉一例：1999年5月14日《紐約時報》記者Elisabeth Rosenthal在北京發出的一則消息，報導北京公眾對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反應。導語是這樣寫的：

“自從上周五北約炸彈擊中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後，中國國營傳媒(State-run media)不停地展示鼓動人心的通欄大標題和照片……”

但是，當中性名詞“國營傳媒”被譯成中文時，它變成了負面的“政府操控的傳媒”(參見李希光&劉濤，1999:94)。這樣的處理可以引發受眾的負面想像，從而支持作者預設的論點：美國傳媒就是這樣妖魔化中國。大多數中國人尚不能閱讀英文，這樣操控翻譯語言可以產生很大的說服效果。

第三，就方法論而言，除了幾篇新左派的學術論文外，這些寫作沒有從社會科學角度去收集系統資料，或是做些扎實的經驗分析，或用其他嚴肅的研究方法去得出結論。它們時常採取對抗性的立場，使用一些選擇性或不可靠的軼事來證明其觀點。不少作者用他們自己的經歷來表達自己的反美立場，這些故事或出自與他們在西方生活的挫折經歷或出自個人原因。例如，“說不”的主要作者之一宋強公開承認，他寫此書的目的不是真正為了向美國說不，而是為了勸說他的女友不要到美國深造。為了留住女友，他開始對美國說不，而且取得了名利雙收的成功(宋強，1999:134)。

第四，對商業利益的追求成了這類書籍作者和媒體的生產動力。

因此，出現了太多的相似題目、相似內容、相似風格。它們大部份是煽情文章的匯編，製作馬虎粗糙。許多文章曾經在別處出現或已經發表，然後被匆忙地推入市場。以“說不”系列為例，1996 年的幾個月內，書店堆滿了“說不”的書籍，例如，“仍然說不”、“就是說不”、“如何說不”、“不僅說不”、“為甚麼說不”等，不勝枚舉。當然，其中不乏抓住商機趁勢推出的暢銷書，並且獲得了可觀利潤。1996 年，“說不”一個月銷出 250,000 冊後，它的續篇在北京以外地區印了 400,000 冊合法版本，“妖魔化”一書首版 40000 冊，一個月內便銷售一空。然而，一些同類書籍却只能望其項背，因為讀者覺得那些書太過粗糙與唯眾取寵，缺乏嚴肅的研究精神。總之，商業指數成了大多數出版者與新聞界的首要考慮因素。這樣做，不僅可以操控公眾輿論，而且在獲得可觀利潤的同時，傳媒不必擔心犯上政治錯誤。這是大陸主流媒體後天安門時期的生存致富法寶，即是前述的“帕雷托佳境”在實踐中的具體運作。

民族主義的四種媒體敘述模式

民族主義思潮崛起是 1990 年代中國大陸政治生活的重要現象，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傳媒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通過民族主義的話語建構和議題操控，主流傳媒與國家的關係發生了深刻的互動。概言之，傳媒建構民族主義話語的模式有四：



表一 媒體論述下的中國民族主義四種類型

類型	肯定型*	武斷型*	好鬥型*	理性／批判型
媒介框架／核心內容	只有共產黨才能代表中國利益，國家尊嚴	中國與西方抗衡，中國百年屈辱	美國是主要敵人（美國圍堵崛起的中國）	呼籲政治改革，民主強國
議題設置策略／情形	按黨的宣傳方針和策略設置	黨的宣傳策略加部份自主安排	商業主導，自主安排為主	替代性，走政治邊緣路線（打擦邊球）
主要特點	和黨的路線保持一致	在官方設定的話語空間中盡力拓展	在商業／市民空間和官方話語空間游移	倡導理性的民族主義
訴求主題	官方版本的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	官方主導下的民族主義	民粹式民族主義	理性民族主義
例証 媒介主導的宣傳戰役	愛國主義教育 香港／澳門回歸申辦2000及2008年奧運	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之報導，中美軍機相撞之報導，“環球時報”	“中國可以說不”系列，“美國媒體妖魔化中國”系列	“南方週末” “開放時代” 一些網上論壇如“問題與主義”
論述特點與話語的採用	動員和宣傳型 官方話語體系	迎合大眾激情和煽情混合型 民間與精英話語混合	好鬥的聳人聽聞煽動型 民間與精英話語混合	知識分子精英話語分析與批判的
官方的態度	全力占據主流輿論空間 大力推銷	贊同，支持	某種程度的合謀，收編及利用和認可	對立的監視和警覺必要時鎮壓

*注：關於術語“肯定型”(affirmative)，“武斷型”(assertive)和“好鬥型”(aggressive)的定義及論述請參看Whiting (1995)。

第一種是遵循官方旨意、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宣傳模式。媒體奉命提醒人民莫忘帝國主義在一個世紀以來對中國人民的欺侮，另一方面則大力宣傳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績如何輝煌。港澳回歸和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的戰績，就是此種新聞宣傳的典例。這是一種“肯定型”的民族主義，媒體跟著官方的主旋律話語翩翩起舞，獲得巨大的經濟回報與社會影響。

第二種比較符合“武斷型”模式。媒體雖然與黨的路線保持一致，但如果有利於己，它們會根據需要，將單一單調的消息處理得武斷煽情。例如1999年5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人民日報》附屬的《環球時報》大量煽情報導，一時銷量急升，吸引其他媒體紛紛模仿。Shambaguh (1996:205) 說，這樣的報導“形式上雖然是武斷的，本質上還是反應性的”。媒體出於商業需要，盡量利用黨所容忍的底線迎合公眾情緒。傳媒在黨設定的基調加上自己的議題，增加戲劇性，引人注目。

第三種是屬於“好鬥型”的模式。傳媒從新左派精英中獲得靈感與理論資源，抓住民眾的怨情，以好鬥的態態攬活民族主義的議題。這種模式的媒體不必時時緊跟黨的路線，只要在黨設定的“愛國主義”界線內外設置議題。例如傳媒為了圖利而推出“說不”系列，儘管當局想與美國修好，黨的宣傳部門不願見到它們大張旗鼓在市場流通，但面對公眾反美的情緒和媒體炒作，當局只能認可。對傳媒來說，這些報導和書刊訴諸公眾情感，追求商業利潤，一舉兩得。中國媒體小報化，更適應了這個模式的需要，前述的《中國日報》和美國前國防部長科恩的罵戰就是一個佐證。媒體採用這種策略，在市場與黨的底線之間轉換；當局默許傳媒存在，是因為雙方在民族主義話語上有共通點，又可以各取所需。第二種和第三種模式都在保護自己，反抗外來侵略或欺凌，是傳媒構建大眾民族主義話語的動力，其中以“中國可以說不”與“妖魔化中國”為典型代表。

第四種可稱為“理性民族主義型”。無庸置疑，這個模式提倡民族

自強，但也呼籲當局進行政治改革，或質疑黨專政統治的合法性。因此，主張理性民族主義成為鼓吹政治改革的間接方法。可想而知，這種策略對黨國體制有潛在的顛覆效果，目前僅處於邊緣地帶。廣州出版的《開放時代》、《南方周末》及其他幾本刊物艱難地走這條道路。一些互聯網上的自由論壇則是另一個主要載體。

這些模式之間的關係如何？第一至第三種為主流傳媒廣泛採用，用以製造與銷售民族主義的盈利產品，這些策略有效又安全。第二、三種策略是傳媒發起的，並與部份新左派精英聯盟，具有大眾性和煽動性。第四種模式對黨國的話語有顛覆性，不屬於主流民族主義的話語範疇，而且常遭當局週期性的打壓；例如2000年當局勒令湖南《書屋》停刊整頓（因發表了何清漣分析大陸社會總體結構演變一文得罪當局所致），次年當局又全面撤換《南方週末》編輯部管理層（因該報成為鼓吹民主自由理念的重鎮，屢屢挑戰當局的言論底線而致，已經數度撤換主編），也因此，這類媒體的生存空間極為困難。

結論

民族主義興起是90年代中國大陸媒體與社會在特定的誘因互動下產生的一股影響深廣的大眾思潮，與80年代的親西方啟蒙運動恰成一個歷史的反差。當傳統馬列主義教義已經失去公眾支持，而可能的政治改革路向又被天安門事件粉碎，民族主義便成為當局填補意識形態真空和統治合法性的思想資源。在這個進程中，傳媒在反映與塑造公眾輿論的影響力愈來愈大，經濟自由化結合了媒體的發展空間和商業利益，主流傳媒在向黨負責的前提下，拼命迎合受眾及市場競爭的需要。同時，媒體的市場自主性提高，也使它們在選擇議題方面有較高的議價能力。民族主義的話語框架和議題建構之所以為主流傳媒採用，就是因為它滿足了以上各種複雜的需要，同時也是對90年代中國和西方一系列衝突的反應和反映。傳媒採用了眾多策略和模式，表現形式及內涵也各有不同。

就媒體市場定位和產品營銷而言，大陸的主流傳媒今天已經占據著有利的位置，因為它找到一個既有商業吸引力，又得到黨和公眾認同的民族主義主題。當然，這種民族主義並不是同質性的，官方的版本是愛國主義，而民間版本則較為混雜，包括反西方的、民族復興的、地域認同的，甚至顛覆反叛的。Unger 指出，它可以同時包含開放的樂觀主義和仇外情緒 (Unger, 1996)。中國大陸正在迅速成長中的中產階級，更提供了一個龐大的媒體消費市場。這個市場發育成長，反過來又推動傳媒的進一步商業化，使之愈來愈趨向民粹主義發展。特別是“小報化”(tabloidization)迎合受眾對煽情新聞的需求，從而操控大眾情緒，進而影響社會主流輿論的形成。但是，在中國大陸特定的政治環境中，傳媒仍有一個明確的禁區，就是不能涉及政治改革與直接挑戰一黨專制的統治，此外當最高當局需要與美國合作或推行多邊外交時，主流媒體還是必須在輿論上配合官方對外宣傳的需要。然而，傳播風格的革命已經帶來內容變化和包括互聯網帶來的資訊自由流通，對大陸今後的社會演變有著重要影響。

近年來主流傳媒與當代大陸民族主義互動的情形顯示，媒體發揮的作用仍在當局充許的範圍之內。在政治權力、市場誘因和傳媒運作的關係中，共產黨將繼續視傳媒為宣傳愛國主義的工具，而市場的興趣則在於需要公眾起伏不斷的情緒波動和媒介購買力從而獲取商業利益，對公眾來說，國家民族身份和愛國主義的情感是他們認同的基本元素。確實，在這樣一個複雜多元的民族主義話語建構中，傳媒可以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九一一”恐怖襲擊後，世界局勢丕變，中國最高當局希望藉反恐統一戰線和美國發展合作關係，故對民粹式民族主義開始有所壓制，主流媒體製造民族主義的議題（尤其是反美的話語）也跟著收斂，但長遠的發展趨勢還有待慎重的觀察，本文僅對 1990 年代的情況作一初步梳理。此外，自 1999 年人民日報網上的“強國論壇”開辦以來，互聯網在塑造民間輿論，尤其是民族主義議題上，扮演著不可忽視的

角色，必須另文專述。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以漢語拼音首字母順序排列）：

- 陳峰等，1996，《中美較量大寫真》，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
- 崔之元，1994，〈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二十一世紀》，第24期，頁5-15。
- 崔之元，1996，〈毛澤東‘文革’理論的得失與‘現代性’的重建〉，《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996春，頁49-74。
- 房寧，王小東，宋強等，1999，《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房寧，王炳權、馬利軍等，2002，《成長的中國——當代中國青年的國家民族意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甘陽，2000，〈重建中國左翼圖譜〉，香港：《明報》，2000年10月1日，E4；及2000年10月2日，D4。
- 何德功等，1997，《傾聽中國——新冷戰與未來謀略》，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 何家棟，2000，〈今日中國新保守主義〉，收錄於李慎之、何家棟《中國的道路》，廣東：南方日報出版社，頁273-291。
- 何新，1991，《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何新，1996，《為中國申辯》，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
《香港信報》，2000，2000年11月21日，頁15。
- 洪永宏等，1996，《中美軍事衝突前前后后》，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 胡續偉，1989，《夢醒的時刻》，北京：中外出版社。
- 瞿湘，2000，《人類的希望在中國》，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
- 李健，1999，《中國九次說不》，當代出版社。
- 李金銓，2002，“建制內的多元主義：美國媒介對華政策的論述”，《二十一世紀》，2002年2月號，頁71-82。

- 李世濤主編，2000，《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 李希光，1998，《中國有多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李希光、劉康等，1996，《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李希光、劉康等，1999，《妖魔化與媒體轟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李澤厚，1987，《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 閔崎，1989，《中國政治文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彭光謙等，1996，《中國為什麼說不？》，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 喬良、王湘穗，1999，《超限戰》，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 《求是》，1990，社論，第.9期，頁8-9。
- 宋強，1999，〈建立二十一世紀的新國格〉，收錄於房寧，王小東，宋強等。《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134-150。
- 宋強，張藏藏，喬邊，1996，《中國可以說不》，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 宋強等，1996，《中國還是能說不》，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 宋連生，鞏小華，2001，《穿越臺灣海峽的中美較量》。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蘇小康等，1988，《河殤》，北京：現代出版社。
- 孫永仁，1991，〈社會主義紅旗必將在中國一代代人手中傳下去——“何新現象”的啓示〉，《中共中央黨校報告選》，1991年第3期。
- 熊蕾，2000，〈贊賞與遺憾——我看美國媒體〉，收錄於顧耀銘主編《我看美國媒體》，北京：新化出版社，頁129-195。
- 楊斌，2000，《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與改革陷阱》，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汪暉，2000，《死火重溫》，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小東，1999，〈中國的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未來〉，收錄於房寧，王小東，宋強等，《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81-118。

王小東，2000，〈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收錄於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頁 86-101。

王若水，1997，《胡耀邦下台的背後》，香港：明鏡出版社。

吳一夫等，1997，《與美國對抗》，新疆人民出版社。

《文匯報》（香港），〈喬良：《超限戰》震驚中外〉，2001 年 10 月 15 日 C1。

蕭功秦，2002，〈新左派與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當代中國研究》2002 年第一期。

《亞洲週刊》，〈喬良專訪〉，第 49 期，2000 年 10 月 12 日。

張寬，1995，〈賽義德‘東方主義’與西方的漢學研究〉，《瞭望》第 27 期，頁 36-37。

張海濤，2002，《何處是“美利堅帝國”的邊界》，北京：人民出版社。

張旭東，2000，〈民族主義和當代中國〉，收錄於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頁 429-439。

張學禮，1996，《中國何以說不》，北京：華聯出版社。

朱立，1997，〈‘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背後〉，香港：《信報月刊》1997 年 5 月，頁 3-8。

《中國青年》編輯部，2000，《潘曉討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中國青年報》理論部，1991，《蘇聯政變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

《中國青年報》，1995，〈中國青年看世界讀者調查統計報告〉，1995 年 7 月 14 日。



英文部份

- Barme, Geremie. 1999.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ernstein, Richard and Munro, Ross. 1997.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Chalmers, Johnson. 1962.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anda, Kayan and Huus, Kari. 1995. "The New Nationalis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58 (45), 9 November 1995, 20-26.
- Duara, Prasenjit. 1996. "De-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Nation."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M.E. Sharpe, pp. 31-55.
- Friedman, Edward. 1997. "Chinese Nationalism, Taiwan Autonomy and the Prospects of a Larger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6, No. 14, 5-32.
- Gan, Yan. 1998. "A Critique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in the 1990s." *Social Text*, 16, 45-66.
- Huang, Yasheng. 1995. "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 *Foreign Policy*, Summer, 54-68.
- Kristorf, N. & WuDunn, S. 1994. *China Wakes*. New York: Times Books.
- Lam, Tong. 2000. "Identity and Diversity: The Complex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imothy Weston and Lionel Jensen (eds.), *China Beyond the Headline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47-170.
- Lee, Chin-Chuan. 1990. "Mass Media: Of China and about

- China." In 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pp. 3-32.
- . 2000a.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isms, Trajectories, and Modes of Understanding." In Chin-Chuan Lee (ed.), *Money, Power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 3-44.
- . 2000b. "China's Journalism: the emancipatory potential of social theory." *Journalism Studies*, Vol. 1, No. 4, 559-575.
- . 2002. Chan Joseph Man, Pan Zhongdang and So Clement.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evenson, Joseph. 1967.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Xiguang and Liu, Kang et al., 1998-9. "Demonizing China"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US press." special issue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 Behind the Scenes of Demonizing China"].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30, 3-102.
- Li, Hongshan. 1997. "China Talks Back: anti-Americanism or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6(14), pp. 153-160.
- Liu, Alan P.L., 2000. "A convenient Crisis: Looking Behind Beijing's Threats Against Taiwan." *Issues & Studies*, September-October 2000, 83-121.
- Pye, Lucian. 1996.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In Unger, Jonathan (ed.). *Chinese Nationalism*. M.E. Shar-

- pe, 86-112.
- Rachman, Gideon. 1996. "Containing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19, No.1, 129-39.
- Rosen, Stanley (ed.). 1997. "Nationalism and Neoconservatism in China in the 1990s." Special Issue,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November-December 1997, No. 6.
- Said, Edward W. 1983.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tz, Benjamin. 1993. "Culture, Modernity, and Nationalism—Further Reflection." In Tu Weiming (ed.). 1993.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3-253.
- Segal, Gerald. 1996. "East Asia and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4 (Spring 1996): 107-35.
- Shi, Zhong (Wang, Xiaodong). 1997.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 30,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7, 8-27.
- Townsend, James. 1996.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M.E. Sharpe, 1-30.
- Unger, Jonathan (ed.). 1996. *Chinese Nationalism*. M.E. Sharpe.
- Wang, Hui. 1998.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nity." *Social Text*, 16, 9-44.
- Whiting, Allen. 1995.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2, June 1995, 295 -316.
- Xu, Ben. 1999. *Disenchanted Democracy: Chinese Cultural Criticism after 1989*.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Yan, Xuetong. 2001.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Jour-*

- 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 (26), 33-39.
- Yu, Xu. 1992. "The Press and Political Continuity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World Economic Herald."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 No. 2, 40-63.
- Zhao, Suisheng. 2000.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No. 1, 2000, 1-33.
- Zheng, Yongnian. 1999.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